

文史通讯

目 录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1

1985

龙游史前梗概·····	周樟炳 (1)
关于姑蔑国和徐偃王·····	胡礼舟 (6)
华岗传略·····	谈滨若 傅能华 (9)
余绍宋生平·····	洪 瑞 (25)
华白沙同志的一生·····	华仑山 (32)
龙游解放的回忆·····	赖谋新 (35)
名医汪容伯生平简介·····	汪体元 (36)
漫谈辛亥革命前后的几次运动·····	祝鹤皋 (39)
聚集大专学生 走向光明大道 ——龙丘学会始末·····	饶敏卿 (43)
龙游县第一个警察署的成立·····	余滋敬 (45)
龙游中学草创和发展阶段概况·····	邱茂森 (46)
关于龙游地方银行的情况·····	余寿松 何燮熙 (48)
谈谈龙游九塔·····	郑金印 (60)
龙游姓氏趣谈·····	胡有松 (51)
政协龙游县委员会广泛征集文史 资料的启事·····	(52)
封面题字·····	钱 铭
封面设计·····	朱传富
“巫氏厅”落成感赋·····	傅春龄 (封二)
封二、三图片·····	龙游县文管会

龙游史情梗概

周樟炳

古往今来，龙游作为江南故国名县，人杰地灵，源远流长。漫漫史情，历历世事，引是邑民志激奋，催万众感发追緬。谨此，撰就梗概以记之。

(一)

龙游县治历史悠久，且多变迁。早在夏、商时期，属扬州地域。周代春秋时，曾为姑蔑故国的国都，在越国西部。据《龙游县志》卷一之《通纪》载云：“周·鲁哀公十三年，越伐吴，吴王孙弥庸寿於姚，自泓上观之，见姑蔑之旗。”此说越王勾线，出兵攻战吴国，附庸于越国的“姑蔑国”人，也随之参战，並虏取吴国王孙弥庸的父亲。吴国王孙弥庸，从泓水上望见越军中有姑蔑人的旌旗。可见，原姑蔑者，即现今的龙游，春秋时就是越国属地。到战国时，则为楚国疆土。

龙游设县建制，起自秦统一中国后，设郡县制之时。始皇二十六年，始在“姑蔑”遗址上设置太末县，属会稽郡。东汉献帝初平三年“析太末”，将原太末所辖之遂昌、衢州、江山、开化、常山等县陆续分出。至三国吴赤乌三年改太末为龙丘；西晋太康元年废丘为太末；初唐贞观八年复改为龙丘；然因嫌“丘”意“墓”系不祥之辞，且又据邑疆丘陵起伏如游龙势态，故于后唐长兴二年（公元九三一年）改龙丘为龙游；北宋宣和三年，又因有：“天下郡县有龙字皆避之”御旨诏示之故，遂又改龙游为

盈川；南宋绍兴元年，又复称龙游，属隶两浙东路衢州；元明之际龙凤五年改县为府，仍置县；吴元年，府废，县如故，属隶衢州路；清代均属衢州府。

新中国成立后，龙游县制一度取消。时于一九六〇年一月，正式并归衢县（后改衢州市）。一九八三年九月，龙游县制又得以恢复。至此，县治建制及名称，虽经择变，但还是保留沿用至今。

如此而言，龙游县地有记载的历史已有二千四百六十余年；龙游县制时间，距今亦有二千二百余年，而正式取用龙游县名时间（即公元九百三十一年起）已达一千零五十四年了。单就县史，堪比原衢县还要久长。

(二)

龙游地处浙西金衢盆地中心，图标东经 $119^{\circ}02'$ ~ $119^{\circ}20'$ ，北纬 $28^{\circ}44'$ ~ $29^{\circ}17'$ 之间。东与金华接壤；南和遂昌毗连；西与衢州为邻；北靠兰溪与建德。境内地势自东南向西北倾斜。大地构造系闽浙地质和江南古陆结合部的凹海地段。地层以红砂岩为主，兼有青石岩和石灰岩及各种变质岩。布有南山和北山两列山脉。仙霞岭余脉耸峙于南，浙东丘陵蜿蜒于北，衢江横穿境内。发源于遂昌应川的灵山江，经由县南坑头乡入境至县城北驿前注入衢江，全长约六十二公里。

龙游自然条件甚为优越。县境内气候属

亚热带。全年平均气温稳定在摄氏17.2度；年均降雨量1631.7毫米；常年平均日照1804.6小时；年均蒸发量1392毫米；年平均无霜期为261.3天。县内丘陵连绵且土地平整，沃土良田，干湿咸宜。傍沿衢江两岸的东西两区，圩地甚多，故此宜种粮、棉、油经济农作物；北区土质肥腻，适合主植稻菽主粮；南区山多田少，山脉巍峨，岗峦层叠。有海拔1438.9米主峰的桃源尖和海拔约1600米高的绿葱湖山岭组成的南山山列群地带，最宜油茶竹木生长。

境内河、湖、矿、堰遍布四乡。据查《龙游县志》卷六之《食货考》水利章节，凡诸湖计有十九；诸塘计有一百四十；诸堰约有四十六。又查《龙游县志》地理考二：“干流谷水，会开化、常山、江山诸水源，並西安众流入境，自西至东凡八十里”。加上“各南支流”，“各北支流”等，形成先天庞大而又自成系统的水利网络优势。旧时，以引灌造福民众见长的西南乡寺后姜席堰为最闻名。此堰位于该乡的山堰潭与后殿铺村的山头之间。系前清龙游知县高英发动，由姜公、席公负责率众始建。俗有姜、席二公造堰之说，故称之。清康熙十九年，经知县卢灿主持重修。源引溪流蓄水，灌溉涉至万亩。此外，又有鸡鸣堰，位于县城鸡鸣山下。（始建何时不详待考证）。俗有范宰相为出嫁于东乡七都的爱女而修堰之传说。概到民国二十三年，当局政府始修。至解放后的一九五二年，人民政府将此堰改修为混凝土坝，沿途灌田五千余亩。又可依仗谷水（即衢江）水源，沿途兴建了龙兴殿、施家埠、茶圩里、蜡烛台等抽水机埠，均以电动汲灌江岸各乡农田。还有闻名县内的东区社阳、十里坪、三爪垅、朱家埠，北区三门寺、蟒塘、八石坂、杨垅等大、中、小型水库，连同西南两区众多的中、小型水库，约五百零三座，总蓄水量计一点一亿立方。凡水库基于山塘，而河、湖、塘、堰截流蓄注，其有效灌溉面积可达

三十一万亩。这一突出的水利资源，最利四乡农耕生计。

县境内水陆运行颇为方便。县城东南环绕的薄溪（即灵山江）汇入衢江，奔东而去，为钱塘江上游之主要源流，是内河航运交通要冲。其总流域面积约二千八百平方公里。水上航程约计三百七十二公里。县境内东西横贯的浙赣铁路，穿境行程二十二公里，设有湖镇、十里铺、龙游、方村等四站。县城北郊虎头山渡口，由清·光绪十四年创设的“平政浮桥”跨骑衢江水面。一九六九年，人民政府拨款建造了全长四百〇八米的虎头山公路大桥，取代了昔日“平政浮桥”，勾通了“龙北”公路干线。县城边灵江溪面上並列三座大桥：一座是建于北宋宣和年的通驷桥（县人又称“东阁桥”）；一座是建于一九三一年铁路桥（当地人称“洋桥”）；一座是建于一九五六年的龙游石桥（当地人称“公路大桥”）。城区三桥，勾通行程可达三百二十公里。

鉴于县境方位、山河、土地、水利、气温、日照、雨量加之交通等众多献益的自然条件，使民生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此条件反饋又奏效于生息财富的开拓和创造。全县拥有可耕良田三十五万七千一百亩；可耕山地和黄土丘陵一百二十余万亩；淡水鱼养殖水面约三万二千亩。全县疆域“东西广五十七里，南北袤一百五十里”。壤地总面积一千一百二十七平方公里。民间曾有中联三十六诸侯造周穆王之反的徐偃王传说，並经韩愈为之记，立碑以祀，声誉龙游古邑。正如《龙游县志》所称：“吾县建县最古，壤地至广”。然县治辖地，据查民国之前，有十一乡三十九都一百四十二图；解放初期，下辖溪口、希塘、官潭、塔石、城关五个行政区；现今，下辖六区一镇三十一乡。其中有县南沐尘乡，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二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发文批准为“沐尘畲族乡”和“老革命根据地”。现今，定居县内民族众多。除汉族外，尚有畲、回、苗、

壮、蒙、满、彝、黎、土、水、毛难、土家等十二个少数民族。现常住总户为八万九千四百二十一户；总人口达三十六万五千六百人。（其中农业人口约占百分之九十）。真可谓民生昌盛，故有：“龙游地，好处境，养吾身，安吾心”的民谚。

（三）

龙游自古以来，多有群雄争夺之举。是浙西战略重地。先就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县城龙游镇，曾于明隆庆二年（公元一五八八年）建筑起城池，围长六华里，设有东永安门、南归仁门、西太平门、北乡义门四城门；另设小东门、小南门、小西门、小北门四便门。其城墙坚固，“东、南、北”三面依水，惟“西”一面紧靠平川，煞是宜守难攻。清·咸丰十一年（公元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侍王李世贤，曾率部将李尚杨坚守城池，开展“龙游城英勇保卫战”。清师左宗棠、杨昌潜也以龙游为据点。拼死顽战，以援省垣。民国初期，国民革命之东路军，也先事转战龙游，后长驱克复杭州。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发生的“龙汤战役”，有北伐军在龙游、汤溪边界，与孙传芳的孟招月部激战，致敌全部崩溃。

逮至近代，兵家名将迭起。见之突出者，有两支红军部队和两支游击部队。即：一九三一年间，由师长郑毅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二师（县人简称“红二师”），曾活跃于县东南和城郊；一九三五年五月，由粟裕、刘英率领的红军挺进师第三纵队，亦曾夜袭龙游城。国内革命战争年代，殷铁飞所率的浙南游击纵队曾转战于邻县遂昌及县南溪口。戴政领导的金肖支队活动在邻县兰溪及本县东乡北乡一带。他们作为军事武装，英勇奋斗。其功绩为世人所称颂，也为后来夺取革命新政权奠定了根基。

龙游政治向以图强奋发著称。旧时，曾

有充任龙游县令的清明执政者。南北朝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宗泽两位文才武将。推行励精图治，安定时政，续举百业。亦有清·光绪年间知县高英，康熙年间知县卢灿两位人称“爱民”之官者，分别设桥修堰，优抚灾区，减免田税钱粮等，造福民间，深得民心。此四人堪为龙游旧时“先圣名流”。

近代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地下党组织活动此起彼伏。

国内革命期间（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全县先后出现四个地下党组织。一为：“中共龙游县委会”。下属组织有：城区区委（分设五个支部）、北区区委（分设二个支部）、东区区委（分设二个支部）、南区区委（分设二个支部）等四个区委共十一个党支部。成员计有九十一名。隶属浙江省委和浙西特委领导。县委书记汪瑞云（后脱党），组织委员沈寰宝，宣传委员方策，农运委员钱春泰等。此间县委，曾在农工民众中点燃“反军阀、反伪政”的革命烈焰。见之闻名的是：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领导的溪口造纸工人二千余人的“放槽”大罢工，为争取增加工资而斗争的声势轰及四乡。县委这级党组织，活动时间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历时五年之久。

二为：“中共龙游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县工委”）。下属组织有：隔坊、桥下、七都、洋坊四个党支部。成员计有三十七名。此间党组织以东区区委为核心，积极开展宣传、组织、武装群众等多种革命活动。起迄时间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八年，历时共十年。

三为：“中共龙南区委会”。有成员一百二十八名。此间，党组织坚持与国民党反动势力作不懈斗争。名震全县的“龙南风暴”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在革命根据地沐尘，有周樟发、雷登连、祝樟才、包长福、钟光荣被敌人枪杀（现五烈士陵墓座落在沐尘村凤凰山下）。“龙南区委”这一党组

织，活动自一九三九年起，至一九四八年止，历时共九年。

四为：“中共闽浙赣边区党委城工部龙游支部”。有：塔石、汤溪、溪口、庙下、城关五个党小组。共约有党员五十名。党支部书记张云舞，组织委员傅春龄，联络委员方维等。此间，党支部主要进行的革命活动是：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党员学习党的文献，秘密翻印散发《土地法大纲》、《加强城市工作和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等党的文件，动员民众革命救国；利用以地下党党员为主要骨干的《龙邱学会》，创办《龙邱通讯》，出版《瞭望》副刊；並运用办“暑期中学生补习班”、读书会、教唱革命歌曲等形式，宣传教育进步青年和农工民众；配合金肖支队“开仓济贫”，开展“抗丁”、“抗粮”、“抗税”、“抗租”、“抗暴”的“五抗”斗争。

至四九年二月，“衢州支部”遭到二次破坏。龙游为配合迎接解放，建立人民新政权等原因，以“城工部龙游支部”为基础，成立起“龙游临时县委会”，隶属“中共闽浙赣边区党委城工部”直接领导。下设：东区、南区、西区（北区）。临时县委书记傅春龄，副书记张云舞，委员方维等，分头负责领导各区工作。此间，临时县委推行《龙邱学会》的“联络感情，砥砺学行，策进事业，服务桑梓”的爱国宗旨，並由傅春龄等撰写革命文章，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党组织散发迎接解放的传单和标语，宣传党的方针，安定社会情势，打击敌伪反动势力和叶岳土匪部队，为建立新政权作不懈的努力。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凌晨一时，人民解放军占领了龙游城，龙游全县宣告解放。同日，县军管会旋即成立。某部副政委马力任“军管会”主任。不久，龙游县人民政府应运成立，宋秀村首任县长。

“城工部龙游支部”及后来的“龙游临时县委会”这一党组织，坚持革命活动，自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历时近一年。

通观县内近代军政革命史实，活跃于县内的四支军事武装和四个地下党组织，堪为县治历史之变革、社会之进步、家乡之发迹的强大推动力，其光辉业绩永垂史册。

（四）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进击、奋斗的龙游知名人士，不乏先例。历史上远古名人就有：南北朝东阳太末（今龙游）人徐伯珍，曾因家贫而“箬叶学书”，勤学苦练十年后，终成通晓经史的著名学者。宋末元初的宋宗室后裔赵友钦，曾定居龙游鸡鸣山，勤于观察天象，钻研“小孔成象”原理，所著《革象新书》是研究古代天文、物理、数学的珍贵文献，是著名天文学家。明代龙游籍人胡荣、童佩均“拥书万卷，反复披寻”，分别著有《谷溪渔唱集》和《童子鸣集》留于后世，两人均为著称江浙的藏书家。

近代龙游县，最负盛誉的“乡贤名人”有：华岗、余绍宋、汪子望、李子珍。

华岗，原名华延年，又名华少峰，华西园，县南庙下人。为我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他先后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巡视员、《新华日报》总编、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曾著有：《规律论》、《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社会发展史纲》、《美学论要》等。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学者，其学术论著和革命功绩中外驰名。

余绍宋，字越园，本县籍人。为我国近代著名学者，著名书画、方志学、史学、鉴古学家。他曾以书画及主编《龙游县志》和《浙江通志》而誉满全国。

汪子望，原名懋均，本县籍人。曾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汉阳兵工厂从事工运工作，因叛徒出卖后英勇就义，其革命精神和高风亮节直为家乡人民赞颂不绝。

李子珍，县南溪口人，曾担任“中共闽浙边区党委福州城工部衢州支部”委员。他在“衢师”任教期间，作为龙游地下党活动的领导人之一者，曾回乡组织“溪口青年联谊会”。于一九四九年五月，衢州解放的前夕，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埋，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

凡此四位本色“乡贤名人”，其政治及社会影响颇为深远，英名千古流芳。实乃添吾县荣光，引籍人自豪！

此外，县城北郊团石区人，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县南灵山寺下人，原浙江大学副校长叶方；县东湖镇人，现浙江省政协常委童超等以及众多居外的龙游籍名流学者，教授、专家、科学技术工作者，遍布全国各地，为振兴中华贡献聪敏才智。恕不一一枚举。

(五)

龙游作为粮食生产为主的综合性农业区域，名物、名产甚多。

全县四乡，盛产稻麦、大豆、油菜籽，还有芝麻、花生及棉花等。分别见有：县东西两区，粮、棉、油农产品丰富；北区除产稻麦豆类主粮外，有突出的农产——乌桕，原产量仅次于兰溪，为全省第二。此外，南区地藏黄铁矿石，是提炼硫酸的主要原料。並见山上有：毛竹、松杉、油茶、桐籽等林木特产。另有银杏、红豆杉等稀有珍贵树木。四乡畜牧饲养业兴旺，先前，传统良种“龙游乌猪”及“龙游麻鸡”驰名远近。县城饮服食品行业制作的“龙游发糕”，县城酱坊（厂）、豆腐厂（场）腌制的“龙游小辣椒”和“龙游开洋豆腐干”“龙游毛豆腐”等优质副食品，均为当地传统名特产，历来享有盛誉。尤以“开洋豆腐干”的质细，色润、味美取信远近顾客，赢得“素火腿”之美称。乡间编织业以县北团石区善塘丁家农户所产“龙游笋壳笠帽”著称县内外。县南溪口乡所产的“清汁笋”罐头食品，曾远销

日本。县东、南两区，乡村手工造纸业发达，所产“黄笺”、“白笺”、“南屏”三种传统纸产品，一直为用户欢迎。近年，龙游造纸厂所产“龙游牌40克1号凸版纸”获国家银质奖，产品远销港澳；所产“字典纸”获省优质新产品奖。产品供上海等地印刷“辞海合订本”，其信誉可与日本字典纸媲美。凡此名物名产，带来传统经济的繁荣，商品生产也自成风格。乡村面貌亦呈现出富盈的新景。出现了东西邵村——“电视村”，占家村——“铁牛村”，真武山下——“花果村”，马元村——“莲子村”，沐尘乡——“文物之乡”。另外，溪口镇有“当地的‘小上海’”之称。

县境内名胜古迹甚多，尤以宋明塔、汉晋墓、清碑刻及牌坊为最。现今，县内存有八塔。分别是：位于湖镇村舍利寺内的“舍利塔”，位于七都乡曹垅村边的“湖岩塔”，位于七都张家埠村的“浮杯塔”，位于沐尘村南山上的“沐尘塔”，（又名“雷锋塔”）位于塔下叶村前山上的“刹下塔”，位于横山村边的“横山塔”，位于县城区鸡鸣山上的“鸡鸣塔”，位于县城区新桥头村的“龙洲塔”等八塔，均风格庄重，气宇轩昂。分别列为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原有九塔，因灵宝塔已拆除，故存八塔。）凡墓葬出土文物，以县东郊东华山和石塔头一带发掘居多。见有：钱斗、铜鼎、铜纺、铜镜、刀剑、釜仓等，不下二十余种。县西南寺后等地发掘的唐三彩驼马为稀世珍品。清碑刻以近年收集的乾隆三十五年之“畚族政策碑”和“马匹管理条例碑”价值为最高。然清代牌坊则以夏金乡江家村的“节孝坊”和七都乡张家埠的牌坊，造型最庄重雅典，坚固完美。

县内风光秀丽。城北郊有“小南海”为本县著名佛教胜地。曾有南海和尚于一九一八年在此建造了“宣坛殿”（“文革”中遭毁）。位于下宅乡，建于唐·太和元年的“乌石寺”也是供人朝香敬拜之处。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张浚、刘光世等，曾在此屯

关于姑蔑故国和徐偃王

胡礼舟

据余绍宋《龙游县志》记载，龙游为“春秋姑蔑之地”。①

又载：“姑蔑故城，在谷水南三里，东门临薄里溪，东西二百一十二步，南北一百六十八步，高一丈七尺，厚四尺，周四百七十步，至今人犹呼寺城麓。”这正是现在龙游城的位置。又据建置考，现在的龙游城，是明朝隆庆二年（公元一五六八年）在姑蔑故城的遗址上建筑起来的。当时姑蔑故城东、南、西、北四座城门还在，筑城时被保留下来，为了出入方便，又另建了四座便

门，这就是现今的小东门、小南门、小西门和小北门。唐代诗人孟郊（公元751—814年），曾经游览过龙游城，并且写下一首诗，题目就叫《姑蔑城》②。诗是这样写的：“劲越既成土，强吴亦为墟。皇风一已被，兹邑信平居。抚俗观旧迹，行春布新书。兴亡意何止，绵叹空踟躇。”诗人当年能在这里“观旧迹”，说明在唐朝的时候，龙游城还有着姑蔑故城的遗迹。

县志又载：“姑蔑故宫，在县治西北百余步，即今灵耀寺。”根据古代的分封制，

（上接5页）

兵，留有摩崖石刻。县南溪口区有一天然自成的“绿葱湖”，座落在二千六百米高的山巅上。传说早先为农民早年求“龙水”的“神地”。县西南的岑山和官潭乡的“龙山”，分别有“望岑山则笑”及“神龙吟舞”之说。八五年九月，由县人民政府拨款复建落成的明末清初古建筑——“巫氏厅”，座落于城区鸡鸣山上。门楣题书《鸡鸣秋晓》，与山上鸡鸣古塔、瞭望炮台、江沿岩洞、翠松崖壁等组合成系列胜景，颇引游人观光。

由此本邑名地、名物、名人、名事、名产、名号、名景、名貌信誉各地。历史上许多名人学士，为之赞美，在龙游留下足迹。见之突出者，有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明末戏曲家李渔，清未经学家、文史学家、诗人俞樾，近代文学家、诗人郁达夫等，都曾为龙游写诗作文。

为继承祖业，激励大志，特撰此文，献给家乡人民。並以乡音结尾：“东游西游，不如龙游也！”

附注：（有关重点史实考证参阅资料）

一、历史及辖地：

▲《左传》鲁哀公十三年，《国语》等
▲《龙游县志》卷一《通纪》

▲《龙游县志》卷六《食质考》

▲《龙游县志》地理考二

▲《龙游县志》疆里

▲《辞海》、《辞源》等

二、物产及经济：

▲《浙江日报》有关载文等

▲《浙江名产》资料辑等

▲《可爱的浙江》

▲有关部门成果、数据、信息资料等

三、军政名人轶事及地下党组织：

▲《华岗传略》及有关载文等

▲《江浙藏书家史略》

▲《余绍宋生平简介》及有关载文等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衢州市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通讯》第十二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金华地委组织部《关于原闽浙赣区党委所属城工部组织金华地区的情况调查报告》

▲中共龙游县委组织部县委组(1985)67号文件

▲中共龙游县委组织部有关地下党组织复查资料

一九八三年十月撰于龙游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改定稿

姑蔑君的爵位是“子”，所以称为“姑蔑子”。据说当年灵耀寺中的伽蓝神就是姑蔑子的遗像。县志还载：“姑蔑子墓，在东华山下偃王别庙后。宋庆元间，为人所发，古物充牣，随即灰散，惟数瓦击不坏，贮水满其中。众并志石毁之。墓北五里，其崇累累如贯珠者凡百余，名百墩坂，皆其疑塚也。”

又据《国语·越语》记载：“勾践之国，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

从上面这些史实记载看来，姑蔑是越国西陲的一个小小诸侯国，龙游是它的都城，这是没有疑问的。

“姑蔑”作为地名或国名，最早见于《左传》。《左传》记载了这样一段史事：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四八二年）六月，越国国君勾践出动军队攻打吴国。姑蔑军队参加了这场战争并俘获了吴国王孙弥庸的父亲。弥庸等人“自泓上观之”，即在泓水之上观望越军时，看见了姑蔑人夺得的他父亲的旌旗。这场战争，吴国大败。越军俘获了吴国的王孙弥庸、寿于姚等，并进入吴国的领地。③明朝万历年时龙游知县万延谦写过一首诗，名《姑蔑墓》。④这首诗的前四句说：“浞封原是越西垂，鞭弥曾随勾践师。云里旌旗出姊妹，江边壁垒泣吴儿。”说的正是姑蔑国参加这场战争的事。

可正是《左传》对这件事的记载，使人产生疑问。记载上说：“王孙弥庸、寿于姚自泓上观之，弥庸见姑蔑之旗。”泓，何处也？查《辞海》，泓乃古水名。故道约在今河南柘城西北，为古涣水的支流。春秋时宋楚之间的泓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从地理位置上看，泓水在淮水以北，宋郑之间。而春秋时的吴、越却明明在淮水以南，而且与泓水相去甚远。吴、越之间怎么会跑到淮水以北的泓水之间去打仗呢？

那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使人想起《龙游县志》对徐偃王的记

载。县志古迹篇说：“徐偃王宅遗址，在县东二十里溪畔。偃王南走，筑室居此，故其溪名筑溪云。”现今的湖镇筑溪桥一带，徐姓人氏甚多，当是徐偃王的后裔。还有灵山《徐氏家谱》是把徐偃王作为祖宗的。而且灵山有徐偃王庙，更确凿的是：唐代文豪韩愈亲自为文勒石，题写《徐偃王庙碑》。⑤从这些情况看来，龙游历史上似乎确有徐偃王。甚至有人还认为他就是我们这个姑蔑故国的国王。⑥其实这种认为，并不妥切。

徐偃王，何许人也？

张华《博物志》上说：“驹王，即徐偃王。据传周代徐戎首领的宫人嫫而生卵，奔到水滨，有犬衔归，暖而成儿，后袭徐国君位，即偃王。尸子曰：‘偃王有筋而无骨’，故曰偃也。”

《辞海》徐偃王条：徐偃王，西周或春秋时徐戎的首领，统辖今淮、泗一带。《后汉书·东夷传》：“地方五百里”，向他朝贡的“三十有六国”。后为楚所败。

而《中国人名大词典》是这样说的：“周穆王时，徐子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导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得天瑞。自称徐偃王，江淮诸侯，从者三十六国。周王闻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爱民不斗，遂为楚败。”

从以上三条可知，徐偃王作为徐戎的首领，他所统辖的地域在今淮、泗一带，与导沟陈蔡之间相吻合，也正是淮水流域，泓水一带。这里离我们现今的龙游也相去甚远。那么，这个徐偃王到底与我们龙游有没有缘分呢，是不是姑蔑国王呢？

这个谜，其实韩愈的《徐偃王庙碑》可以解开。碑文说：“徐与秦俱出柏翳，为嬴姓，国于夏殷。……徐处得地中，又德为治，及偃王诞，当国益除去刑争末事，凡所以君国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义。……咸宾祭于徐，执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国，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闻之，恐。……与楚连谋伐徐。徐不忍斗，其民北之彭城武

原山下，百姓随而从之万有余家。偃王死，民号其山曰徐山，凿石为室以祠偃王。偃王虽走死失国，民戴其嗣君如初，驹王章禹祖孙相望。……衢州故会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县龙丘有偃王遗庙，或曰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而之越城之隅，弃玉珎于会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执于吴，徐之宗族子弟散之徐扬二州，间即其居，立先王庙云。”

从碑文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徐偃王确以仁义著闻，穆王令楚伐之，徐不忍斗，败退南逃。逃到什么地方呢？“北之彭城武原山下”，即现今江苏徐州一带，并且死在这里，“民号其山曰徐山，凿石为室以祠偃王。”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徐偃王并未死在这里，而是带了部分遗民继续南走，到了“越城之隅”，即现今的龙游，并在这里建立了姑蔑国，定居下来。更可能的是，“徐之宗族子弟散之徐扬二州，间即其居，立先王庙”，其后裔假托徐偃王之名在这里建国立业。

能解开这个谜的还有余绍宋《龙游县志》在“周本春秋姑蔑之地”下面的附注。附注说：“韦昭《越语》注则谓姑蔑今太湖”，这与徐偃王败走南下的地域相吻合。又提到杜预《集解》对“瑕丘其析则隐公元年盟郕之姑蔑”和对“哀公十三年姑蔑之旗”中姑蔑的注解不同。“明谓：蔑，姑蔑，鲁地，鲁国卞县南有姑蔑城。”也就是说，当时的鲁国卞县南有姑蔑城，这与徐偃王当时统辖的淮、泗地区相吻合。又查《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⑦则说，“姑蔑（春秋），山东泗水东。”“姑末（战国），浙江金华西旧龙游县北。”另外，我们知道，在古代，“蔑”、“末”、“妹”是同音的。因此，可以说，“姑蔑”、“姑末”、“姑妹”可以同指一个地名或一国名。

综上所述，关于姑蔑故国和徐偃王，可以这样认为：姑蔑（或姑末、姑妹）确是徐偃王在周穆王时期建立起来的一个诸侯国。原先是在淮、泗一带，杜预《集解》说鲁国

卞县南有姑蔑城是对的。以后周穆王令楚伐徐，徐不忍斗，经彭城武原山下，败退南走。按照这条路线，在今徐州、太湖一带，都留下了遗民，自称姑蔑国人，因而韦昭《越语》注，说姑蔑今太湖，也是对的。但徐偃王及其随从看来并未全部在彭城定居，而继续南迁，到了“越城之隅”，也就是到了我们现今的龙游县，并在这里建立了姑蔑国，这个姑蔑国可能是徐偃王建立的，也可能是偃王后裔建立的。因此，说龙游是姑蔑故国的都城，这也是对的。但到了“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四八二年）”，参加越、吴之战的时候，姑蔑国的国王就不是徐偃王，而是徐偃王的后代了，因为从西周穆王时代到春秋鲁哀公十三年，姑蔑国已存在四、五百年的历史了，这期间的国王，当然不知换了几代了。

因此，应该承认，历史上的“姑蔑”（或姑末、姑妹）不只在龙游一处，而有几处：一处淮、泗一带；还有在彭城或太湖一带；看来都是由于徐偃王的立国和南迁而形成的，徐偃王确是姑蔑故国的始祖，但不一定是我们龙游一带的姑蔑国的始祖。前面提到的春秋越、吴之战怎么会跑到淮河以北的泓水去打这个谜也解开了，那可能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误将南迁以后的姑蔑当作西周穆王时代淮、泗一带的姑蔑，而泓水在淮、泗之间，于是想当然，这场越、吴之战便发生在泓水。其实这个“泓”不应解作“泓水”，而应解作一般的深水、河流。吴、越之战发生在江南，定有江河阻隔，“自泓上观之”也就不足为怪了。

注：①引自地理考·沿革。

②余绍宋《龙游县志》文征·诗一。

③《左传》·鲁哀公十三年。

④见余绍宋《龙游县志》文征·诗二。

⑤见余绍宋《龙游县志》文征·文一。

⑥《龙吟》一九八四年第一期，黄萍荪《小县识大》篇。

⑦张传玺、杨济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华 岗 传 略

(初 稿)

谈 滨 若

傅 能 华

华岗，又名华少峰、华西园，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著名学者。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青年团的地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华北巡视员、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和山东大学校长等职。一九五四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五年受到错误的审查和处理，长期关押，一九七二年在狱中含冤病逝。一九八〇年经党中央批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几十年的革命岁月中，华岗不仅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也是一位勤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一生在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上都有很大的成就，为革命和学术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

一九〇三年六月九日，华岗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庙下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幼名华延年。他的父亲华三铭毕生务农，耕种着祖上遗留下来的十几亩薄田，养活全家七口

人（夫妇俩和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父亲性格耿直，思想比较开明，上过几年私塾，爱阅读报刊，关心时事，对子女影响较大。母亲是个勤劳俭朴的妇女，终日为家务操劳。华岗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他受家庭影响，从小养成爱劳动的习惯。他年龄稍大，就常到田里帮助大人干农活。

辛亥革命后，村里有几个外出求学的青年人，回到家乡，宣传民主共和，反对封建制度，主张兴办实业和教育。庙下村集资办了一所初级小学。于是，十一岁的华岗才有了入学读书的机会。

初小的先生思想比较进步，学校颇有点“新式”味道。课程有国文、算术、手工和美术等。先生在课堂上还给学生讲述帝国主义列强怎样侵略中国，清朝封建专制政府怎样腐败，中国四万万同胞应该自强以御外侮。这些民族民主的启蒙教育，使华岗幼小的心灵渐渐插上了理想的翅膀。他决心要按照先生的教导，努力学习，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华岗学习很用功，每门功课都是优等，经常受到先生的夸奖。他在初小读了两年，又考取了离家五里路的溪口镇等高小学。

这所高等小学，设在溪口镇内的一座祠堂里，学校的设备虽然并不十分齐全，但华岗已感到非常满意。每天他总是带着课本和午饭，早早来到学校，无论刮风下雨，从不迟到或缺课。他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按时完成作业，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务求弄懂弄通，从不轻易放过。十三、四岁的华岗，就十分懂得爱惜时间，每天从家里到学校的来回路上，他也利用时间背诵课文。课余到图书室去阅读书报，并把对时事看法写成日记和作文。老师很称赞他的日记和作文。常常在他的本子上批写“清顺无疵，识解俱超”之类的评语。

那时浙江西部山区的经济和文化落后，山村里书籍十分稀少。华岗每得到一本书，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一拿起来就舍不得放下。正月里村子里有灯会，镇上还请戏班子来演戏，华岗很少出去玩耍。父亲看他这样好学，尽管家境不甚宽裕，还是省吃俭用，千方百计地筹措学费，让他继续上学。

高小毕业后，华岗要求继续上学。可是当时浙江省西部山区中学很少，每个县只有一所中学，而且学费很贵，一般人家是读不起的。贫家子弟要升学，不能不首先报考半官费的师范学校。但师范学校几个县只有一所，每年招收四、五十名学生，只有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才能考取。华岗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衢州师范学校。

衢州是浙西重镇，北临衢江，江岸是一片葱茏的桔子林。衢州师范学校就在城中的钟鼓楼前。校舍是一排灰白的半旧楼房。生长在小山村的华岗，初到城里，一切都感到新鲜，视野也开阔了许多。可是，他最感兴趣的仍然是读书。

师范学校的课业负担比较重，一般学生往往感到学习吃力。华岗基础扎实，加上又很用功，所以能够应付自如。他在同班同学中，不仅功课好，而且也谦虚，乐于助人，所以很快得到同学们的推崇，被选为级长。华岗平日生活俭朴，能吃苦耐劳，从家里到

衢州城有六十多里山路，每次寒暑假，他总是挑着锦盖步行来回，有时还要从家里背些山芋粉之类充饥。冬天寒风凛冽，虽有时无棉衣御寒，却从不松懈学习。生活再苦些，也要尽量积攒下一点零用钱，到旧书摊上买些有价值的书籍认真阅读。他自己每读一本书，总要作笔记，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去请教师长，或者与同学进行讨论。华岗在星期天也很少休息，他决心趁年轻精力旺盛的时期，抓紧一切时间尽量地多吸收些古今中外的科学文化知识。后来，索性连假期也不回家，留在学校里看书学习。他读书涉猎的范围越来越广，吸收知识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大量的知识装进他的脑海里，为他后来参加革命工作和进行理论宣传及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二)

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也震动了古老的山城衢州，衢州师范的学生们一颗颗火热的心也沸腾起来了。那时陈独秀、胡适、吴虞等人的一些论著在学校内流传开来。北京、上海等地的新报刊，也在学生中竞相传阅。华岗和同学们一起分析各种观点，力求辨别正误，还写出文章投寄报刊，阐述自己的见解。从此，华岗对新兴科学和新文化运动悉心探求，热心于学生运动。学校当局蛮横地干涉学生运动，华岗因领导同学反对学校当局的蛮横干涉而被开除，迫使他中断了在师范学校的学习。

一九二四年暑假，华岗改名华少峰转入宁波第四中学学习。宁波第四中学，全称是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是由原来的宁波中学和宁波师范合并起来的。校长经亨颐（廖承志的岳父）是一位开明人士、进步的教育家。他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校长时，因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而被军阀卢永祥撤职。来到宁波后，他继续支持学生们的进步活动，他撤换了那些头脑封建、思想顽固的教员，而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具有真才实学和救国抱负的教师。当

时，宁波是浙江革命运动比较集中开展地区，中国共产党在宁波已成立了特委。经亨颐校长在宁波特委的影响和推动下，在校内进步师生的合作下，大胆发动师生宣传革命，积极鼓励学生进行爱国活动。他不但允许学生星期天可以上街宣传，还允许在每星期三下午作为进行爱国活动的时间。华岗在这里，一边废寝忘食地学习，一边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鼓励同学们进行反帝、反军阀、反封建势力，宣传革命的有力骨干分子^①。就在这一年，他由张秋人、潘念之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恽代英同志来到宁波，在宁波后乐园、鼓舞台多次进行讲演，听讲的除了许多小学教师外，主要是宁波四中的师生。华岗作为共青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积极地组织了这些活动。他还积极参加了非基督教同盟和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此外，他还参加了进步刊物《火曜》的编辑工作，共出了二十多期^②。这时他认识了恽代英同志，并开始接受组织的委托，为《少共国际》等刊物写稿，介绍中国青年的斗争实况。

一九二五年，华岗在南京由吴芳和曹壮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因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中学未毕业，就毅然中断了学业，完全投身于大革命的斗争洪流之中，开始了职业革命活动家的生涯。

在整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华岗主要从事青年团的宣传和组织领导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五年五月）、南京地委书记（一九二五年六月至十一月）、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二六年三月）、江浙两省联合省委宣传部长（一九二六年三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华岗亲身经历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是当时我党在青年工作中的重要骨干^③。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倒在血泊之中。华岗没有被敌人的磨刀所吓倒，不顾个人的安危，出生入死，仍然坚持在白区进行青年团的宣传和组织领导工作，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浙江省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四月至八月）、江苏省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和顺直（河北）省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五月），一九二八年五月，他在白色恐怖下冲破国民党的重重藩篱，到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同时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期间，他见到了斯大林同志。回国后，他在上海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并主编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列宁青年》（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二九年三月）。

一九二九年三月，华岗离开团中央，专门从事党的宣传和组织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一九二九年四月至十二月）、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二年三月）和华北巡视员（一九三二年三月至九月），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进行着出生入死的战斗。

在这期间，华岗还从事紧张的著述活动。他从当时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撰写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这是一部对当时革命斗争起巨大鼓舞作用的革命史书。他最初起意写这部书，是在广州暴动后不久的时候。那时在革命营垒中，有的人背叛了，有的人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华岗作为这次大革命的参加者和幸存者，他“觉得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可以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实在太多了，它不但教训了领袖，而且教训了群众，如果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为立场，把大革命的史料整理出来，一定可以取得许多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④”于是，他便广泛搜集材料，并且很快编写了一个大纲。后来，因出国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共

产国际的会议，不得不把这项工作暂时搁置下来，把材料和大纲存放在上海一位同志家里。一九二八年秋，华岗从外国回来，发现那位同志已经被捕，而他过去苦心孤诣所搜集的材料也完全丢失了。他并没有因此灰心放弃这项工作，而是又重新开始搜集材料。特别是一九二九年秋天，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结合成取消派，一起攻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因此，华岗认为“真确史实之流传，乃更有必要”，这促使他加快了大革命史的编撰工作。他根据当时能够搜集到的材料和自己参加实际运动的回忆，力图按照党的“六大”精神，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总结这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从一九二九年秋天开始动笔，到一九三〇年春天完成了初稿，同年冬天又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一九三一年七月，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由上海春耕书店首次出版。此书的第六章《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还连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

这部书共分七章，三十万字。华岗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我敬以至诚，将此书纪念大革命中及大革命失败后成千上万为革命牺牲的英勇战士。”尽管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书中有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不免受当时流行的左倾观点的影响而不尽恰当，但他确是怀着很深的革命激情，热烈地歌颂了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所掀起的新民主主义第一次大革命运动，而痛斥使这次革命遭致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并且向国内外人民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运动的种种诬蔑；为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流血牺牲的几十万革命烈士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我国的史学史上，这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现代史著作。有的人评价说：“从那时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华岗同志的这本书到现在仍然是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唯一著作。”

“读来使人感奋，使人神往，使人充满民族的自豪感。”⑤不少老同志回忆当年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深情地说：“我知道华岗这个名字，正是从阅读《中国大革命史》开始的⑥。”当时一些地下党组织，把《中国大革命史》作为党员和革命群众学习的材料之一，许多革命同志都从此书中受到教益⑦，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由于阅读了马列主义的著作和这本书，而增添了革命的勇气和力量。

注：①周闪跃：《北伐前夕宁波学生“拥经亨颐”的斗争》。《浙江革命史料》1981年纪念中共诞生六十周年特辑。

②潘念之1983年接待谈滨若访问时回忆。

③陆定一同志1983年4月15日在一次征集党史资料的座谈会上，讲到华岗的这一段革命活动时说：“从1925年我就同他一起在青年团里工作，他当时是上海青年团干部中的‘四大金刚’之一，他很有学问。”

④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自序。

⑤廖盖隆：《华岗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重版前言。》

⑥赵健民：《纪念华岗》。《光明日报》1982年3月17日。

⑦许涤新、胡绳、林默涵、蔡维生、蒋南翔等同志都讲过自己受了《中国大革命史》的启示和教益。

（三）

一九三二年九月，党中央任命华岗为中共满洲特委书记。他化名为刘少陵，在由上海出发到东北赴任途中，因护送的交通员被特务认识跟踪，他和交通员一起在青岛被捕。

面对敌人的严刑审讯，华岗一口咬定自己是“皮货商人，非共产党员”。他坚决不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保守了党的机密。敌

人使用种种威胁利诱的办法，企图迫使他就范，但他沉着应付，巧妙地编造口供，迷惑了敌人，使他们弄不清他的真实姓名和政治身份。结果，他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判了五年徒刑。他先被关在济南法院看守所，后来转到山东省第一“模范”监狱。

在狱中，他和任作民（山东地下党省委负责人之一，狱中化名王敬功）等同志一起，团结全体政治犯。坚持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在狱中开办干部训练班，提出在狱政治犯的主要任务，一是“保健”，二是“学习”。为此，规定了读书、休息、游戏的一定时间，禁止抽烟喝酒，他们秘密地购买和阅读报纸和理论书籍，定期讨论各种政治时事问题。华岗和任作民分别担负政治、党建、群众工作等课程的指导任务，提高青年同志的政治理论水平；还指定文化水平高的同志帮助文化水平低的同志读书识字，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在此期间，他们还多次组织狱中的政治犯进行绝食斗争，以抗议监狱当局对政治犯的虐待和限制，提出了反对打骂犯人，开放脚镣手铐，自由看书看报，改良犯人伙食等要求。通过这些斗争，使狱中的生活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并且通过这些斗争，也锻炼和考验了每个政治犯的意志，鼓舞了他们争取自由的胜利信心。

他们在狱中的这些活动，对山东后来的工作（如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等）都有一定的影响，确实证明了“监狱是革命者的休养所和学校”这句名言①。

一九三六年底，山东在监政治犯除少数判无期徒刑的人外，按国民党的法令已经服满三分之二刑期者，都应该进反省院了。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法院和监狱当局就奉国民党政府命令，将全均政治犯送往反省院。山东反省院仅能容纳九十多人，他们决定把大批政治犯分送南京、太原和武昌等地。一九三七年二月，华岗和任作民等十九人被送往

湖北武昌反省院，在新的条件下，他们继续进行着斗争。

被送入反省院的政治犯，首先要填写“入院调查表”和“自述”。在所要填写的表格中，除了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之类的例行项目之外，最重要的是：加入何种党派、担任过何种工作、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和态度等几条。国民党当局想通过填表和写“自述”等办法来套取口供和软化政治犯的意志。华岗和任作民等早在看守所和监狱里时，就讨论过到反省院后应该坚持的立场：“不求出院（有可能再送回监狱），不损害党的组织和政治影响。”②

在反省院中，被反省的人按文化程度编为研究组（大学生以上）、甲组（高中生）、乙组（初中生）、丙组（精识字）、丁组（不识字的）共五个组。华岗和任作民一起被编在甲组。院内出版了一种反省月刊。月刊的编辑，名义上是由反省者中选出，实际是由院方的训育科负责编辑，所有稿子都由他们选择、修改。内容有什么随感录、政治论文、三民主义、院长主任的讲演词笔记，以及诗词、小说，有时还把那些“精彩”的自述登上一篇。他们屡次催华岗和任作民为月刊撰文，但都被拒绝了。于是又逼迫他们为院长主任们整理讲演记录，但他们每次整理的记录院方总不满意，有时还要叫教员们去大加修改。因为这些讲演，本来就不漂亮，东拉西扯，杂乱无章，华岗和任作民从来不为他们修饰美化。

凡入反省院的人都要参加上课，课目有国民党的党义、国文、历史、地理、政治学、军事体操等。国文课每隔两三星期有一次作文，题目是什么“时事评论”、“历史论文”、“谈交友”、“我的家庭”等等，故意要把它联系到反共、党派、主义等方面来，是反省院对反省者的一种“考验”。此外，还规定每天要写日记，日记上可以表示悔过或告密等。训育科随时抽阅各人的日记，对那些符合他们要求的，就批上“颇有进

步”之类的话。再有，每星期要开一次讨论会，形式上由反省人自己召开，主任教员旁听，讨论题目是指定的，离不开“反省生活”、“入院感想”、“自我检查”等等。华岗和任作民对那些作文日记之类，向来采取敷衍的态度，日记往往三、五天甚至一星期才写一次，内容只写天气晴雨变化，自己的健康状况，以及抄录一些《中山全集》的语录之类，从不写任何卑躬屈膝和不利于党的言论。他们的日记可以随时向任何人公开。讨论会则经常请病假不去参加。相反，则利用反省院的图书室，广泛读书，研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至于自然科学等，以丰富和加深自己的学识。

在武昌反省院，没有正式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只有一部分人特别接近，有问题互相商量，在一般反省人中起主导或指导作用。华岗和任作民（王敬功）、向明（王仲和）经常在一起商量一些问题，如研究“自述”如何写法、讨论会如何发言、对反动分子怎样给以精神制裁、对某些青年如何教育等。他们还会发动全院反省人要求上前线杀敌、无条件释放政治犯、抗议对某个人的处罚、邀集二十多个人自己组织伙食团等等。

反省院以六个月为一期。满六个月的，都经个别审查，院方开一次预备会议，初步通过，再召集“评判委员会”。参加人有院长、高等法院和国民党党部代表各一人，反省院管理、训育两主任。“评判委员会”通过后就正式公布出院人名单，然后由院方指定出院人宣言起草人。宣言写得不好的要强制重写，院方有权修改（甚至代作），修改后交出院人签名画押，出院宣言和名单全部登报。出院保结，本人找铺保或人保，外地人由反省人连环保。

华岗同任作民一样，在反省院住满六个月后并未被释放。理由是他“表现不好”，没有按院方所要求的说出组织关系，不表示反对共产党的态度，日记写得不充分，不肯写文章等等。院方决定要他再住六个月。管理

主任找华岗和任作民谈话，要他们重新填写一张入院调查表，再写一篇“自述”。他们表示拒绝，并且找院长提出抗议，质问说：

“现在已经是全国抗战的局面，共产党已经实行改苏维埃为边区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国共两党重行合作，为何还不释放我们？我们出去了难道不是和国民党去一致抗日吗？”院长被问得无言可对，只得连连说道：“我也愿意你们出去，不过这是中央的法令，我也没有办法。”于是，华岗和任作民就“请长假”休息，从此不再上课、不参加开会，不写日记，除吃饭、睡觉，看自己想看的书外，其他的活动一概不参加。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展，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新形势，为各地政治犯的出狱提供了一个前景。华岗买通狱卒，给当时在武汉地区做秘密工作的冯乃超送出了一封秘密信件。冯乃超立即报告了当时在武汉的董必武同志，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指名在湖北反省院要释放两名政治犯，一名是华岗，另一名是任作民。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被敌人折磨了五年之久的华岗和任作民，以共产党要员的身份，昂首阔步走出武昌反省院。敌人从华岗身上什么也没有捞到，反省院的“主任”、“教员”们，直到这时才知道自称皮货商人的刘少陵原来就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华岗，他们都惊愕而又无可奈何地望着他和任作民，出院时居然还在反省院内排列两行，夹道欢送。

华岗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里，立场坚定，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五年的监狱生活，丝毫没有动摇华岗的革命意志，却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体。但为了革命的需要，他置个人安危而不顾，又迅速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注：①②任作民：《两次被捕情形》。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省志资料》1959年第三期。

(四)

华岗从武汉反省院出狱，在担任了短期的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之后，即受党的委派参加《新华日报》的筹办工作。《新华日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一份大型机关报，它很快成为我党在国统区从事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群众运动，传播党的纲领路线和政治主张的有力工具。早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迫答应国共合作抗日，同时答应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机关报。但他随后又反悔，采取拖延的办法，直到一九三八年一月才给《新华日报》发了登记证。这年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潘梓年担任社长，华岗担任总编辑，并兼《群众》周刊编辑。那时报社的人员不多，工作十分繁忙。华岗同社长潘梓年、副总编辑章汉夫及其他同志一起从筹备到正式出版，日夜紧张地工作。华岗作为总编辑，掌握编辑部的全面工作。他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五年的牢狱生活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体，他的脸色苍白有些浮肿，神态凝重显露出受折磨的痕迹。可是对于繁重的工作，而且是不熟悉的编报工作，他把全部精力都放进去了，从新闻修阅和文章的审阅修改，包括撰写专论，一直到版面的编排以至校对工作，他都亲自动手和过问，“他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①他除了用华岗、华西园署名写重要的报导和评论文章外，还常用林石父、晓风等笔名写各种类型的文章，内容涉及国际、国内、经济、军事、文化等广泛的领域。他那忘我的工作精神，瘦小的个子，伶俐的口才，文章写得相当快而有力，这些特点，给同志们以深刻的印象②。一位当年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同志回忆说：“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学问渊博文思敏捷的学者。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写作文章和社论，真是‘下笔千言，立等可待’，他对

待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从没有见过他有疾言厉色时候。他对待政治上原则问题却十分认真，从不苟同，也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这一切引起我对他的尊敬，把他当作自己的导师③。”

在《新华日报》，华岗坚持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路线，抵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当时，王明高居长江局书记的职位，又有共产国际代表这个显赫的头衔，加上那如簧之舌，确实迷惑过一些人。王明在党内和《新华日报》实行家长式统治，他在宣传上和国民党唱双簧，提出所谓“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纲领。王明经常写文章贩卖他的投降主义货色，要《新华日报》把他那又臭又长的文章和讲话刊登在显著的位置，标题字号要大，署名要把王明、陈绍禹同时写上，以示其地位特殊，还常常发表“王明启事”、“陈绍禹启事”，并要求配发他的标准像，大肆宣传自己。华岗对此深恶痛绝，常常嗤之以鼻，他说：“这哪里是什么启事，明明是为他自己做政治广告！”他在私下对人说：“王明那一套是不行的，中国革命的希望在于延安，中国革命的领袖是毛泽东。”④正因为如此，王明对华岗十分忌恨，在长江局会议上对华岗进行打击报复。到后来，作为总编辑的华岗，处处遭到王明的排挤和打击，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一九三八年春，他被派往东南战场作战地记者。他深入前线，写下了第一篇战地通讯：《活跃在东南战场的新四军》，在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的报纸上发表。他从东南战场回到武汉后，又奉命提前撤离武汉，带领一部分编辑、印刷、营业部门的同志，携带一部分物资，乘两条大木船溯江西上，到重庆去筹办《新华日报》。一九三九年秋，华岗的总编辑职务也被撤销了，他不得不离开《新华日报》。

由于在狱中的长期摧残和出狱后的忘我工作，华岗的健康恶化，在离开《新华日

报》后，他在重庆郊区养病。养病期间，他仍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紧紧围绕当时革命的需要而从事研究和写作。在抗日战争紧张的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他编写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实与经验教训，藉以鼓舞抗日战争情绪，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民主抗战方针，反对中途妥协，避免重蹈过去民族抗战失败的覆辙^⑤”。这本书虽然名为民族解放运动史，但对于中国内部的社会解放运动也加以记载，因为这两者是根本不能分离的。他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求解放的斗争历史，同时也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一部克服阶级矛盾并在克服这种矛盾的基础上来争取民族彻底解放的历史。^⑥”此书长达四十万字，一九四〇年由上海鸡鸣书店正式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数年之间，竟重印八版之多，各地新华书店且作为中等学校暂定的中国近代史读本，大量印行。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确实起了很大的教育鼓舞作用。

在四十年代初期，华岗还写了《社会发展史纲》和《苏联外交史》以及许多历史论文（其中有的论文，如《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阻滞的基因》，后来汇编成《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华岗又将原《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中关于太平天国和五四运动两章，加以修改和补充，写成《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两册单行本，由海燕书店出版。这些著作，都是出于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在广大青年中和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南方局为了保存干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部分干部疏散到外地。华岗根据周恩来的直接指示，

到西康雅安（今四川西部），后联系几个同志，做刘文辉、潘文华和邓锡侯等人的统战工作，当时环境十分艰险，在雅安到处特务横行，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华岗夫妇不得不将刚刚生下的孩子送给一家贫农抚养，三个月后，孩子生病，因无钱医治，而活活病死了。华岗没顾得上去看一下自己的孩子，又马上赶回重庆，参加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和整顿三风的学习。

一九四三年，华岗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接着，他又被派往云南作统战工作。这年春天，他从重庆到了昆明。他当时的正式身份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到云南龙云处的代表，公开任务是清理和收容长征时散失在云南各地的红军指战员。实际上他到昆明还有更重要的使命：作龙云等人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和共产党合作；另外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昆明民主运动、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运动积极地进行指导和开展工作^⑦。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化名林少侯，由楚图南及尚诚两位同志介绍，应聘担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他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参加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等，开展地下工作。他同周新民、李文宜等团结政界、文化教育界许多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大力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他主动结识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著名人士，参加他们主办的定期学术讨论会，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当时，云南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要力图控制云南，激化了与龙云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矛盾。除此之外，从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疏散到昆明的一些学者、名流、教授和昆明本地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待抗日救亡的形势，对社会上一些问题的看法、做法都存在着不一致、不协调，甚至有分歧。即使是从外地疏散到昆明来的青年学生也对云南的所谓“土包子”青年学生有着这样那样的一些成见，彼此不服气，